



# 李泽厚的党报访谈：多元、 宽容、理性、法制



【财新网】(专栏作家 祝华新)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于 11 月 2 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去世，享年 91 岁。

书摊吆喝，街头咨询

对 80 年代的过来人来说，李泽厚如雷贯耳。他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作孤军深入的重新勘察，以一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征服了莘莘学子。他的著作摆上了街头的个体书摊，摊主拉长嗓音叫着“李泽厚、托夫勒、弗洛伊德……”风光之至，虽然老派的学者听了不免摇头。

李泽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是 1956 年。首都学术界纪念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才两年的李泽厚被安排与另外三位老学者一起做学术报告，时年 26 岁。少年出道的李泽厚，有学术定力。在左倾当道的年代，《红旗》杂志多次约稿，都未动心。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升一批研究员，其中包括经济所的刘国光、哲学所的邢贲思、历史所的李学勤，还有李泽厚。

1984 年，一些知名学者来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参加咨询服务活动。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副院长夏鼐、汝信、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外文所所长叶水夫、法学所所长王叔文、文学理论家唐弢等，还有美学家李泽厚。85 岁的法学家张友渔细心地解答了关于宪法和正在酝酿的新闻法、出版法等问题。马洪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倾听市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告诉记者：群众提出的问题，可以使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开阔思路。(1984 年 4 月 2 日人民日报) 这样的情景，恐怕只能发生在 80 年

代，全社会尊崇知识，尊重人才。

在全国人大提出抛弃新民主主义是损失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8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泽厚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小组发言，大胆提出：建国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苏联经历了 70 年又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当年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人民日报摘发了李泽厚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上，李泽厚还主张：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是建设的哲学。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无疑应继承发扬，但那时的许多做法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罗荣兴、谷嘉旺、曹焕荣《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1988 年 4 月 7 日人民日报）李泽厚 90 年代初跟我谈到，马克思一些东西没有过时，还值得研究。他主张回到伯恩斯坦，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注重阶级政策调整。

“走得太远”还是“太保守”？

80年代百无禁忌，思想激荡。李泽厚曾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感慨：我们正处在两代人的中间，一方面觉得我们走得太远，一方面则觉得我们太保守。从美学研究到90年代的“国学热”，李泽厚都曾“两面受攻”。但他说：“我不管两个方向上的责难，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与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的文学对话，发表在1988年4月12日人民日报上。李泽厚对舒婷、北岛这些年轻诗群给予热情评价，称为“新文学的一只春燕”。舒婷的诗表现当时青年一代真实的苦闷和追求，“这种伤感的内涵是现代的，但形式则有点古典味”。李泽厚希望作家气魄能更大一点，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和各种气候，甚至动摇原来雄大的构思。“真正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现在发表或者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

李泽厚主张文学多元化，尊重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文学的并存和竞争。但他本人还是更喜欢反映社会忧患的作品，喜欢社会艺术，不喜欢沙龙艺术。刘再复谈起当时报告文学流行，李泽厚强调：躲到“象牙塔”里，历来为中国作家所不齿。“中国还那么苦，如果作家什么也不管，忘记自己的责任，对人间的痛苦无动于衷，就缺乏作家的良知。”同时，他希望报告文学重点应当是“报告”，报告的特点就要求真实。如果虚构，那就变成小说了。

1989年我采访李泽厚，4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访谈《中华民族需要建设性的理性》。在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那个风雨欲来的时刻，李泽厚

捻出 8 个字：“多元，宽容，理性，法制”。作为学者，李泽厚说自己不喜欢很多太富于情感的词，认定那些是“不科学的语言”，也不赞成那种“只有我对，你们都要不得”的心态。他希望提倡一点卡尔·波普的“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精神。“中国现在最需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

李泽厚谈到，自己跟青年朋友的分歧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非理性，一个是关于彻底反传统。北师大一名博士生出了一本书“与李泽厚对话”，批评他缺少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李泽厚迟迟未作回应，告诉我从这类批评中发现只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找不到“真正的理论挑战”。“年轻人对很多东西不满、愤怒、苦闷，恨不得捣毁一切。我非常尊重年轻人的这种情绪，但何必用理论去面对或消解这种正当的情绪呢？”但他忍不住还要说些话：“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卫兵现象近似。这种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冲力很足，有很大鼓动力量，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很可能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乱骂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点学术建设却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缺乏的是建设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

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

80 年代意识形态领导人胡乔木欣赏李泽厚。乔木有一次出席中国社科院会议时，忽然当众招呼坐在台下的李泽厚上台来。在某个进退两难的时刻，李泽厚在广州给乔木打电话，乔木答复：安全没有问题。乔木出面保

了李泽厚。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有人在报纸上批评说：李泽厚“在败坏一代学风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实在是不足为训的”（199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1992年1月3日，李泽厚携妻赴美，在科罗拉多学院做讲座教授，也经常回国。1993年李泽厚被推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李泽厚在北京寓所再一次接受我采访，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态势给予肯定。他说：我还是“吃饭哲学”，经济为本。外面说我迷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吃饭哲学。这十年来中国有很大发展，比苏联东欧好，很不容易。12亿人口的大国（当年的总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宏观有一点点进步不错了，虽然微观处理还有问题。只要不内乱就有希望。有很多问题逐步消除，要改良不要革命。

可能是考虑到我当时还是党报记者，李泽厚表达了对体制的善意期待。他说支持保有一定国有资产，维护社会稳定，消化农村几亿剩余劳动力，中央要有强大的权威。一放不得了，天下大乱。当然有度的问题。但走回头路，把民企当国企看待和干预也不行。

李泽厚谈到，我们缺乏强有力的宗教传统，宗教性道德有一种畏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814](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814)

